

中国高等教育

百年史论

田正平 商丽浩 主编

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

发展模式的选择、传统资源的调适、制度的建设、财政的支持与运作的汇聚与流动等，所有这些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中遇到的重大课题，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主题的延伸与再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高等教育

百年史论

田正平 商丽浩 主编

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

发展模式的选择：传统资源的调适、制度的建设、财政的支持与运作、师资队伍
的汇聚与流动等。所有这些在中国当代高等教育改革中遇到的重大课题
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主题的延伸与再现。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人民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史论——制度变迁、财政运作与教师流动/
田正平、商丽浩主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6
ISBN 7-107-19716-9

I. 中...

II. 田...

III. 高等教育—教育史—中国—现代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70369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38.75

字数: 53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52.4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本书系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成果

国家“十五”规划“211”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导 论 模式的转换与传统的调适 /1

第一编 制度编

第一章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 /21

一、洋务运动时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萌发 /21

- (一) 洋务运动时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萌发的因素分析 /22
- (二) 京师同文馆与洋务运动时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萌发 /42
- (三) 现代高等教育制度萌发时期的经验与教训 /48

二、清末现代高等教育制度雏形的形成 /52

- (一) 维新运动时期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 /52
- (二) 维新运动时期教育制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 /69
- (三) “新政”时期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基础的确立 /75
- (四) 高等教育制度变革与晚清高等教育发展 /89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 /92

一、民国初年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 /92

- (一) 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制度建设的主要举措 /92
- (二)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101
- (三) 民国初年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经验与教训 /113

二、20 世纪 20 年代改革高等教育制度的新探索 /118

- (一) 20 世纪 20 年代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因素分析 /118
- (二) 20 世纪 20 年代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 /125
- (三) 自下而上地展开：20 世纪 20 年代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

目 录

特点 /139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 /141

(一)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因素分析 /142

(二) 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制度变革 /150

(三) 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制度变革的简短评价 /165

四、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制度变迁的历史轨迹 /169

(一) 难以摆脱的日本影响 /169

(二) 德国大学制度的引进与实验 /171

(三)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全面借鉴 /175

第二编 财政编

第三章 高等教育财政制度的变迁 /183

一、晚清高等教育财政制度 /183

(一) 晚清中央、省级政府教育财政职能 /183

(二) 晚清高等教育经费的拓殖 /190

二、北京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财政制度 /204

(一) 政府教育财政职能与高等教育 /204

(二) 各级教育财政与高等教育经费 /210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高等教育财政体制 /214

(一) 教育财政制度与高等教育 /214

(二) 国民政府的高等教育财政收支 /219

第四章 高等学校教师薪酬制度的演进 /233

一、晚清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 /235

(一) 从外国教习审视中国教育 /235

(二) 从传统官绅考察晚清教习 /245

二、北京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 /253

(一) 北京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水平 /254

(二) 北京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横向薪酬结构 /261

(三) 北京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纵向薪酬结构 /269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 /276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薪酬水平 /276

(二)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横向薪酬结构 /287

(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高等学校教师的纵向薪酬结构 /296

第五章 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 /307

一、晚清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307

(一) 观念转变的艰难与实践改革的滞后 /308

(二) 癸卯学制的颁布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出台 /311

二、北京政府时期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314

(一) 高等教育收费实况 /314

(二) 高等教育收费影响 /317

三、国民政府时期高等教育收费制度 /322

(一) 高等教育收费实况 /322

(二) 高等教育收费所引发的风潮、议论和影响 /329

第三编 教师编

第六章 思想的论争与教师的流动 /345

一、桐城“古文派”与江浙“新思潮派”对北京大学讲堂的争夺 /346

(一) 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346

目 录

(二) 最高学府中的“桐城古文派”	/351
(三) “新思潮派”的崛起	/356
(四) “新思潮派”与“桐城古文派”的思想论争	/368
二、东南大学“学衡派”与北京大学“新文化派”的抗衡	/381
(一) “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文化观	/382
(二) “学衡派”与“新文化派”的抗衡	/387
(三) “学衡派”与东南大学	/394
三、“新文化派”的分道扬镳：学术与政治的不同取向	/398
(一) 以大学为中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399
(二) 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向革命之途	/402
(三) 由“议政”走向“参政”：融入国民政府官僚机构	/404
(四) 追求思想独立与意志自由：由校园走向市场	/406
 第七章 校长的教育理念与教师的流动	/409
一、蔡元培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与北京大学	/410
(一)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与教师的聘任	/410
(二) “学、术分校”、北大学科改革与教师的流动	/414
二、郭秉文的“文理并重，学术并举”与东南大学	/417
(一) 通才与专才的平衡：学、术并举的大学理念	/418
(二) 人文与科学的平衡：文、理并重的大学理念	/422
(三) 延师有道，俊彦云集	/425
三、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与南开大学	/427
(一) 多层次选聘教师的机制	/429
(二) 选聘与培养相结合的制度	/432
四、梅贻琦的“端赖大师，教授治校”与清华大学	/436
(一) “端赖大师”与名师云集	/437

(二) “教授治校”与教师队伍的稳定 /440

五、竺可桢的“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与浙江大学 /442

(一)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与浙大教师队伍建设 /443

(二) 战时浙大教师的流动 /447

第八章 学术机构的建立与教师的流动 /453

一、中国科学社与东南大学 /453

二、清华国学研究院与清华大学 /458

三、南开经济研究所与南开大学 /465

第九章 政治干预与教师的流动 /471

一、政治势力的“渗透”与东南大学的衰落 /472

(一) 东南大学的“易长风潮” /473

(二) 东南大学的衰落与教师的离散 /476

二、京师大学校与北京大学的受挫 /478

(一) 奉系军阀与京师大学校 /479

(二) 奉系军阀统治北京时期北大教师的流动 /480

三、北伐统一与罗家伦出长清华 /484

(一) 罗家伦出长清华之背景 /484

(二) 罗家伦的改革与清华教师的流动 /486

(三) 清华教师品质之提升 /490

四、首都南迁与中央大学的建立 /493

(一) 首都南迁与中央大学 /493

(二) 中央大学的建立与教师的流动 /498

第十章 经济窘迫与教师的流动 /507

一、艰难的索薪 /507

目 录

(一) 北洋政府时期北京国立大学经费概况 /508

(二) 索薪运动 /511

(三) 经济压力下的教师流动 /515

二、生活压力与教师兼职 /519

(一) “讲师”称谓之衍变 /520

(二) 20 世纪 20~30 年代初期教师兼职之概况 /522

(三) 抗战时期生活重压下的教师兼职 /533

第十一章 战争压力与教师流动 /538

一、北伐战争与政局的变动 /540

(一) 革命中心的形成与中山大学的成立 /540

(二) 北伐战争与教授“投教鞭而从戎” /543

(三) 革命的“偏轨”与教师的流动 /546

二、抗敌御侮与大学内迁 /550

(一) 大学内迁 /551

(二) 大学内迁与教师的“长征” /556

(三) 战时教师的流失 /568

(四) 战后复员与教师的流动 /574

三、1946~1949 年国内战争时期的大学教师流动 /582

(一) 内战中高等学校的生存环境 /583

(二) 坚守岗位与南迁 /586

(三) 命运的抉择 /594

参考文献举要 /600

后记 /609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至今已经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百年来，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经历了产生、发展、初具规模直至今天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的世纪之初，回顾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总结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中的特点和经验教训，对于思考和把握未来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中国古代即有培养高级人才的太学和国子监，唐末宋初以后产生发展起来的书院，也大多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己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产生最早而且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高等教育却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和发展，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属于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过程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

可以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1894 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 1862 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 1866 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 1894 年前后，国内共创办了 30 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在外力胁迫下清政府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现代学校为榜样，借鉴西方学校的教学制度和课程设置。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时期，1895～1911 年。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 和 1898 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大学的雏形。20 世纪初，清政府颁布并实施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 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①，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而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据统计，在

^①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6 页。

1906年前后，有12 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各级各类学校学习^①；至1909年11月，在中国执教的外国教习共365人，其中日本教习就有311人^②。与前一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时期，1912～1927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初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③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国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

①② 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165页。

③ 蔡元培：《自写年谱》，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1989版，第312页。

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于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又一重镇。

综上所述，1912~1927年的十几年间，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经历了由取向日本到借鉴德国，再到模仿美国的转换过程。

第四时期，1927~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定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规定，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就是1927~1929年所实行的大学区制。

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之后，于同年6月接受蔡元培等人的建议，设中华民国大学院，由蔡本人任大学学院院长。大学院既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也是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不隶属于国民政府，而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领导。在大学院中设大学委员会，议决全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切重大事项，独立于政府之外。在省一级，试行大学区制，按当时行政区划，在全国建立若干大学区，每区内设国立大学一所，区国立大学校长为大学区区长，综理学区内一切学术教育事宜。1927年7月起，大学区在江苏、浙江、河北三省陆续试行。蔡元培建立大学院制的意图是：通过这种管理体制上的改革，摆脱军阀

甚至包括政府对教育的控制和干预，防止教育行政部门的腐败，使教育与学术合而为一。而这一改革举措的思想源头，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①。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果而终，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但是，就现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也确实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时期，1949～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1957年，中国政府派出7 000多名留学生到苏联各高等院校学习^②；与此同时，我国高等院校聘请了754位苏联专家到校任教，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③。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教师培训，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时期，1958～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

^① 蔡元培：《请变更教育行政制度呈》，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五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35页。

^{②③} 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第880～881、918页。

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外国的任何“模式”。这一时期，经历了1958~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大跃进”。全国高等学校数由1957年的229所骤增至1960年的1289所。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全国高等学校数又由1960年的1289所压缩到1965年的434所。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则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时期，1978年以后。这一时期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逐步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20世纪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中央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①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

^① 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国教育报》1998年5月5日第1版。

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考察就会发现，百年间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借鉴“泰西”）—单一的价值取向（取向日本）—多元化的努力（融合美国与欧洲）—单一的价值取向（学习苏联）—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生产知识和传承知识的重要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百年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与发展模式不断转换紧密相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传统与移植的关系。如前所述，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不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自然延伸，而是在西学东渐潮流的冲击下，在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深刻变动